

● 韩康信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 种族人类学研究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 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恺

装帧设计:闫醒民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著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电话:225358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者 新疆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1/32 850×1168(mm)

印 张 13.75 插页 4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12 月新疆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7 月新疆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200

ISBN7—228—02369—2/K · 236 定价:25.00 元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编委名单

顾 问 李康宁 买买提祖农
 龚金牛 陶世义
主 编 周菁葆 陈重秋
常务编委 来建中 殷 晴 陈世良

“Series of Silk Road Studies”

Edited by

Advisers	Li Kangning	Maimaitizunong
	Gong Jinniu	Tao Shiyi
Editors-in-chief		Zhou Jingbao
		Chen Zhongqiu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Editorial Board

Lai Jianzhong	
Yin Qing	Cheng Shiliang

序

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而论，我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是外行，本来没有资格对韩康信先生的这一论集进行评论，但康信先生真诚的面嘱，又使我不便推辞，所以只好从对新疆人类学研究怀有深厚感情的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点与这一文集不无关系的情况。

我可以十分认真的对读者说，这部有关新疆人类学研究的论集，将有助于深化、拓宽人们对古代新疆居民种族成份的认识，是新疆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新的、有重大价值的科研成果，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研读。

新疆是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因为民族众多、种族复杂，过去曾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人种博物馆”，可见新疆居民的复杂种族特征对人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么多的兄弟民族，聚居在天山南北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论哪一个民族，今天又具有怎样的体质形态特征，他们都是人类历史演化的产物。每一个民族究竟怎样发展成今天这样的体质特征，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认真和周密研究探索的问题。人们对自身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怀有强烈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心理现象。对新疆古代居民的体质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人类学研究，则有助于解决这一命题和满足人们这方面的求知欲望。

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人类遗骨需要人类学家鉴定，而人类学的研究又得益于考古发掘提供的人类学材料。我和韩康信先生的认识、合作正体现了这两

个学科的难以分离的关系。在不断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发现并采集了许多古代人类的骨骼标本，其中有距今4000年前后罗布荒原上的古代居民和3000年前后的阿拉沟、鱼尔沟人、两千年前的乌孙人等。但因为我们对人类学只有一点毛皮知识，难以向读者提供可靠的人类学测量资料及科学的分析结论，所以只有向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求援。我和韩康信先生的接触、认识就是这样开始的。记得最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1977年，地点就在阿拉沟口的烽火台下。接到我们的邀请，韩康信先生和潘其风同志一道，风尘仆仆来到了当年还相当荒凉的阿拉沟，和我们一道借住在解放军的营帐中，在十分简陋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开始了他们对阿拉沟、鱼尔沟的体质人类学的初步测量工作。康信先生一丝不苟，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新疆考古所的不少同行都直觉地感到新疆不少古代遗址的居民颇多欧罗巴人种特点，尤其是在汉代以前的早期墓葬人骨中，看得相当明显。但在“欧罗巴人种”中还存在不同的类型学上的变异，这需要作更精细的人类学分析。研究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及其与现代新疆各民族的体质人类学关系，更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可以说自1977年阿拉沟工作开始，韩康信先生即与新疆考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四、五年来，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古代新疆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不论是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罗布荒原上的古墓沟、楼兰城郊、哈密的焉不拉克、洛浦的山普拉等古代人类学资料，都曾经过了他的认真分析。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论集，正是他十多年工作的结晶。这是根据实际发掘资料作出的结论，所以较之古代文献中十分简单的记载自然要可靠、准确，更具有科学价值。

希望这个论集的出版促使更多的考古和人类学学者关注这个领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现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新疆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史研究贡献力量。

王炳华

THE COLLECTED PAPERS ABOUT THE
RA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HABITANTS

Contents

Preface

Introduction

1. The ra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Xinjiang inhabi Tants
2. The anthrop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human skulls from the ancient cemetery at Gumugou, the Kongque River
3. The study of the human bones from the ancient crowd graves at Alagou
4. The analysis of the racial element of the human bones from the ancient Yanbulak cemetery at Hami
5. The study of the anthrop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Tudunmu cemetery, Zhaosu
6. The problem about the racial system of the human bones from Shanpula, Luobupo (Lop-nor)
7. The study and restoration of the skulls from the ancient crowd graves at Shanpula, Luopu
8. The anthrop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human skulls

from the Loulan site

9.The human skulls unearthed from the Xiangbaobao cemetery, Tajike

Appendix

- 1.The anthropologicsl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Saka, Wusun, Xiongnu (Hun) and Tujue (Turk)**
- 2.The illustration about measurement items of human skull**

绪 论

在古代丝绸之路新疆路段上，曾经分布过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之国。《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从汉武时的三十六国到分裂为五十多国，显示了西域纷杂的族组合和族分裂。许多学者对此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对丝路诸国的族源史有相当多的考证。其中也往往伴随古代族史的讨论，对西域诸国人民的种族（人种）属性给予种种推测。其依据不外靠文献、语言乃至考古文化。例如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其《西域文明史概论》中，以为从新疆地下发现之古代语言文字具有印欧语系特点，推论西域古代居民为雅利安种或伊朗人种。又据王国维的《西湖考》，‘前汉人谓葱岭以东之国为西湖，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湖，南北朝人亦并谓葱岭东、西之国为西湖’，提出了大的地理分布的族或模糊的东、西人群之分布。又如安作璋在其《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中称：“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居民大约都属于氐羌系；在大沙漠以北，自疏勒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这儿的“氐羌”是文献上的古族名，“原始的蒙古种”是人种名，两者并用，容易造成学科称谓的混淆。在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里，把前人对西域诸国人种的研究归为三说，即吕思勉的塞种即闪米特族（Semites）说，王日蔚的伊兰种说，张星烺的印度日尔曼说。他自己主张西域人种两系说，即按《汉书·西域传》之注，判断乌孙为白种之诺的克

(Nordic) 系，与北欧之条顿人、西亚之波斯人、阿富汗人相近；塞种即闪米特系，与古巴比伦、古亚述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同类。因此他判定，至少两千年前，越葱岭而直至新疆境内是“白种人之天下”。在这个判断里，虽持西域白种说，但仍然是以族为种的一种说法。美国的W.M.麦高文在《中亚古国史》里论及土耳其斯坦太古居民时，也大致如是，以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或更晚时，中亚的雅利安人的一部分向东迁徙至喀什噶里亚（即中国新疆境内）。这儿的雅利安人实系语族，常被用来作西方人种的代称。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更多。大致来说，上述民族史学者的研究虽以族论种，但都取西域白种说。

然而也还存在相反的说法。如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史》里以葱岭为界，主张“葱岭以东，以黄人为主。葱岭以西，以白人为主”。又说“其东，非无白人，其西，非无黄人”，也有黄、白人“混合者”。这儿的黄、白人大概系指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俗称。他对中国史之汉代西域诸国之种族的判断又有“塞种、氐羌、汉族三种”之说。显然这还是以族论种的说法，但大致持西域黄种说。黄文弼在他的《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里也提出与白种说大致相悖的议论：“虽吾人不能说西域无雅利安人参杂其间，但在汉代西域人从其体质及分布区域，主要不是雅利安人，而为东方种族”。据黄氏之考证，在西域这个地盘自古“即有汉人、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并按地区，“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里吉斯原野，故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邻于印度，故杂印欧种；吐鲁番盆地则汉人较多”。但他在《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里，依生活及服饰之比较，又说楼兰之土著“与塞种人不无关系”，“楼兰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为羌戎即塞种人之裔

胄也”。

应该说，从民族史料的研究论民族之人种就如知道一个人的姓名而推其籍贯，看似有关，但又非必然。这种推论方法的限制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史料记述的不完全，常常是有此无彼，不可能对古代族的方方面面有完整的认识。其次，历史上的族特别象丝路新疆段上的族类不仅十分多样，而且更迭频繁。另一个最普通的常识是族和种的分类，一个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是生物人类学的，两者不是相同范畴的。何况史料记载人种特征寥寥无几，无法精确判断。因此以族量种的史料考证，对西域的种族（人种）不可能作出精确判断。又如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特别是对西域种族繁复杂错地区，以语言文字推定种族更应该谨慎。因此，很难根据史料或语言文字资料的考证，对西域的居民整理出比较科学的合乎现代人种分类的系统来。从这个意义上，民族史学的研究如果缺了族起源和形成的生物学（人种学）背景，使人有“见物不见人”之感。象丝路这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古代通道，了解这个通道的开拓和通达者的人种生物学特点，无疑是丝路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多少年来，多少人想说清楚又很难说明白的问题。因此，直接对丝路新疆路段上古代居民遗骸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但一般来说，象对待现生族类那样进行人种形态学调查，由于这些古代族的居民已经不保存软组织而难以考察。一个补救的办法是对保存下来的古人骨骼进行形态学的观察与研究。尤其是头骨部分，常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的与活体头、面部特征相关的形态学特点。对这些特点，用专门的测量、观察和统计分类方法，提供充分的数据进行生物统计学的比较，也就是用人类学

的所谓“民族人类学”(Ethnic Anthropology)方法，对具体的人群或属于一定地域和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遗骨(特别是头骨)进行再研究，即可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这些彼此有联系的地域群体在人类学和生物学上一般称之为“种群”(Populations)。人类学家研究古代和现代人类种群，区别这些种群所特有的体质特点的组合。这种组合特点称为“人类学类型”。如果这些组合特点现在或过去与一定地域相联系，那么这种组合特点便称为“种族(人种)类型”。英国的A.斯坦因据西域古文字(康居、龟兹和于阗语)之印欧语结合死者形貌特征(如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头发弯曲如波状、须短黑及长头型等)，断定新疆古代居民为西方阿尔宾人种(*Homo Alpinus*)，与现代的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人相近。这是早期学者试图利用形态学特征的组合求证新疆人种属性的一个例子。但这仅是孤例干尸的观察鉴定，缺乏群(组)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A.基思也报导过A.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的四个地点采集的5具古代头骨。他认为这些头骨具有自然演化形成的介于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的过渡特征。德人C.H.约尔特吉和A.沃兰特则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调查时采集的四个地点11具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他们把这些头骨分成三个形态组，即第一组为长颅型，与诺的克(Nordic)人有许多相似，同时与A.基思的楼兰型(Lou-lan-type)也有很大相似；第二组是具有中国人(汉人)特征占优势的中间类型；第三组具有阿尔宾(*Alpinus*)性质的短颅型，属伊朗人类型。俄国的A.H.优素维福奇也报告过从罗布泊附近掘走的4具所谓古突厥头骨，认为它们属于蒙古人种系统，但未能判定是哪种蒙古人种类型。从这些并不多的骨骼形态学资料来看，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种形态很可能多型的。

除了骨骼的鉴定，英国学者T.A.乔伊斯还发表过A.斯坦因

在中亚探险时收集的新疆及其邻区的活体形态调查资料，共25组，每组调查人数9—72人不等。据他的分析，新疆及其邻接地区存在5个人类学类型，即阿尔宾、土耳其、印度—阿富汗、藏、蒙种族类型。这种多人种类型与新疆周围地区分布的种族环境大致符合：在新疆东西，直接和狭面的东亚蒙古人种占优势地区相连；其南是藏族占优势地区；向北同准噶尔相接的是北亚蒙古人种广布地区；向西和向南，与暗肤色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人种）和帕米尔—费尔干人种类型分布地区相交错。因此，从现有不多的一些现代人体质调查资料和古代人骨鉴定资料来看，西域的种族环境显然属于人种学上典型的接触地带、从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开辟和通达很可能与这种多人种的复杂交错环境密切相关。但究竟是怎样的种族（人种）环境导致丝绸之路的开通？这个问题如果只用民族史学研究的以族量种的讨论是很难得出可信的结果。而过去少数几个外国学者发表的体质人类学资料还非常有限，特别是每个地点能提供的人骨数量过少，因而难以估计遗址人口的种族形态的变异价值。再如这些资料所用的观察和测量方法上和后来学者的资料难以统一比较。在个体的人种鉴定上还存在某种夸张，如从一个头骨上有的竟能判别出三、四个人种类型的混合特点来，令人难以置信。还应该特别指出，这些人骨多系采集品，缺乏系统考古发掘资料和精确的时代证据。所以也不能根据这些有限的资料对丝绸之路上的种族问题作出可靠的解释。

为此，我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借介入新疆鉴定古代人骨的机会，对出自不同古墓地的人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同时也开始了收集原苏联境内特别是中亚、哈萨克斯坦、南亚伯利亚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古代人骨资料。这个准备工作做了好几年，然后才陆续整理和拟写研究论文。从八十年代中，这些论文的单篇形式相继在《考古学报》、《人类学学报》、《考古与文物》等刊物上

发表。人骨涉及的地点包括孔雀河古墓沟、托克逊阿拉沟、洛浦山普拉、楼兰城郊、昭苏、哈密柳树泉焉不拉克、塔什库尔干香宝宝等七个时代大致从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公元初的古墓地，它们都位于西域丝绸之路上。论文涉及了180多具头骨材料。这些材料对研究丝绸之路上的种族特点显然十分重要。尽管我自己的水平有限，整个研究还待继续扩大和深入，但作为一个阶段的成果，这个论集的促成毕竟凝结了我多年的心血，是我一生从事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它即将出版的时刻，我首先要感谢新疆的考古学家们，是他们亲手从各个发掘工地细心收集了这些人骨材料，并毫无保留地交给我研究。我还要感谢新疆考古所、博物馆和人民出版社的先生们，特别是王炳华、李恺、陈重秋、林丽等先生，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这个论集的出版注定是不可能的。还应该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热心支持这个论集的出版，也是我十分感谢的。如果这个论集最终能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们接受和有所裨益的话，那将是我的莫大欣慰。但我自感这个论集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初作，有很多不足和错误，所得初步结论可能在以后更多新材料的研究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之后，必定会有新的认识和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论集的资料价值长于论著的结论，给后继的人类学研究留下一分参考引用的比较资料。这也是为什么采取专业性很强的论集形式出版的主要原因。

这部论集的材料来自新疆，现在把这个论集奉献给热情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新疆的朋友们。论集中的不足和错误，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作者 1992年2月于北京

*Associated Project of the
UNESCO Silk Roads Projec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

目 录

序

绪 论

- | | |
|----------------------------|-------|
|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 (1) |
| 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 | (33) |
| 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研究..... | (71) |
| 哈密焉布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 | (176) |
| 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 | (261) |
| 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种系问题..... | (305) |
| 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 | (330) |
| 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 | (345) |
|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 | (371) |

附 录

- | | |
|---------------------------|-------|
| I 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 | (378) |
| II 头骨测量说明..... | (414) |
| III 英文摘要..... | (421) |